

# 桐城与扬州的对话：从江淮走向世界<sup>1</sup>

狄霞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要】**：由江淮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桐城派及扬州派因学术及文学宗旨的不同，长期以来被视为观念相左的两派。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与考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误解主要源于江藩与方东树的意气之争，平心论学的一面却被掩盖。经过阮元、曾国藩等人的先后调和，二派得以取长补短，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晚清“日本文体”的壮大引起了两派对国粹沦亡的共同担忧，他们携手抵制，促使更有活力的“新文体”诞生。以曾门四弟子与刘师培为代表的二派殿军都曾走出国门，在与域外知识人互动、互助的同时推动了江淮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更新，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桐城派；扬州派；江淮文化；日本文体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5-0150-011

DOI:10.16064/j.cnki.cn34-1003/g0.2023.05.016

## 一、桐城与扬州的对话

桐城与扬州，是江淮地区的两大代表性城市。它们均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由长江、淮河冲击而成，历史上两地长期同属一省/州管辖。<sup>1</sup> 它们都使用江淮官话，同属江淮文化圈。在思想文化领域，二地出现了举世闻名的桐城派及扬州派<sup>2</sup>，横跨学界与文坛。在学界，以阮元、焦循、刘师培为代表的扬州学派视皖派汉学家戴震为马首，以考据见长<sup>3</sup>；而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则学宗程朱，以宋学为核。崇尚实际的汉学学风与推崇心性说理的宋学学风宗旨不同，影响了两派对“道”“艺”“义法”“文章”等概念的理解。在文坛，以《文选》为则的扬州文派偏爱六朝偶文韵语，被视为文尚散体的桐城派之挑战者。<sup>4</sup> 两派的影响力均超越了江淮文化圈，成为全国性的思想文化流派。

不过，对于两派的研究尚有诸多未尽之处。因“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sup>[1]</sup>而闻名的桐城派，往往被视为清代第一大文派而忽略其思想学术属性；扬州派则被一分为二，谈文学时称其为“仪征派”或“文选派”，谈思想学术时则称之为“扬州学派”，难免一叶障目。后人多关注两派之“异”而忽略其“同”，对其“国粹”属性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外域文化挑战时的变化语焉不详。

桐城派与扬州派虽有不同的渊源与追求，也存在诸多交集。论辩时尽管有短暂的唇枪舌剑、电光石火，沉默时却有长久的深思熟虑、择善而从。一些细节在提醒着我们，两派之间或许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般势同水火。阮元如果有意扬汉抑宋，为何会在其所修之《国史儒林传》中以黄宗羲、顾炎武作为清朝汉宋两派的共同开山，标举“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sup>[2]</sup>？桐城派如果拒斥汉学、骈体，姚鼐门生孔广森为何会拜汉学家戴震为师，刘开、梅曾亮、管同为何均精于骈体？扬州派如果抗拒桐城文，刘师培怎言“桐城文章有宗派，杰作无过姚、刘、方”，称许“方望溪之文，句句洁净”<sup>[3]</sup>？李详何道“弟子姚郎中学问，亦所宗仰”<sup>[4]</sup>，肯定“桐城方植之诗文俱有门径”<sup>[5]</sup>？两派若都固步自封、萧规曹随，为何都有汉宋兼采、骈散互鉴的迹象？

<sup>1</sup> 本刊网址 · 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作者简介**：狄霞晨（1986—），江苏溧阳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

---

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妨进入两派出现抵牾的语境之中。对这段历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如此道来：

方苞……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姚范从子鼐，欲从学戴震。震固不好为人师，谢之。姚鼐屡为文诋汉学破碎。而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遗余力。自是两派始交恶。5

这段话道出三条线索：一是方苞与汉学者相轻，二是姚鼐拜师戴震被拒，三是方东树《汉学商兑》诋毁汉学家。

就前二事，近今已有学者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漆永祥通过史料考证及比对，认为方苞与江永在京师“论礼交恶”论为江藩篡改史料之结果，其实方苞始终礼敬江永等汉学者。戴震不愿收姚鼐为徒，与其不喜为师有关，对姚鼐仍非常引重。[6]92-100 王达敏认为姚鼐拜师见拒对姚、戴关系并未产生严重后果。[7]佐藤一郎也认为直至戴震去世三年后，姚鼐对戴氏依然怀有旧友之情，怀念着往日共同切磋精进的岁月。[8]77

如果前两条线索都经不起推敲，第三条线索或许才是关键。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与江藩出版《汉学师承记》抨击宋学直接相关，书中有一段谈及扬州汉学家文论，更是揭示了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

汉学家论文，每曰土直韩、欧，又曰骖矣韩、欧……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阮氏著《文笔考》，以有韵者为文，其旨亦如此。江藩尝谓余曰，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又凌廷堪集中，亦诋退之文非正宗，于是遂有訾《平淮西碑》书法不合史法者。[9]

方东树在此处集矢于扬州汉学家文论，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扬州人江藩之语“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显然戳到了方东树痛处，成为刺激他著《汉学商兑》的一大动因。在方东树看来，以汪中、阮元、江藩、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派多贬低唐宋八大家，而后者却正是桐城派追宗之人。他曾谦卑上书求阮元“正八柱而扫秕糠”[10]，竟被束之高阁。在方东树看来，这些扬州派人士不仅在经学上尊汉抑宋，在文学观念上也与桐城派背道而驰。

从上文来看，方东树痛惜的焦点在于扬州派诋毁唐宋八大家，但实情并非如此。他将汪中列于其首，实有未谙。其实汪中为文不专一体，凌廷堪曾抱怨其“既以萧刘作则，而又韩柳是崇，良由识力未坚，以致游移莫定”[11]，可见其既学六朝偶文韵语，又推崇韩愈、柳宗元。江藩虽对方东树说“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他自己早年却颇喜唐宋文，后来凌、阮二人提倡骈文之后，江藩才态度大变，批评八家。[12]凌、阮二人虽喜偶文韵语，却仍尊重韩愈之文，凌廷堪曾赞韩愈之文“化偶为奇，戛戛独造，特以矫枉于一时”[13]，阮元亦肯定“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14]。由此可知方东树所言扬州派“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有失偏颇，近于臆想。更何况上述“扬州学派”人士大多祖籍徽州<sup>6</sup>，扬州派与徽州学术的密切关联，也为我们思考桐城派与扬州派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扬州派并非《汉学商兑》中唯一受攻击的对象，却是方东树格外在意的汉学家群体。桐城方东树与扬州江藩的私人恩怨，加上阮元等人有意标举偶文韵语，质疑唐宋八大家文的“正宗”性，使得方东树对扬州派的评价戴上了有色眼镜。而实情却如漆永祥所言：“乾嘉间并无桐城诸人与考据学家的严重对立，不存在当面交锋、唇枪舌剑的学术辩论……后人论桐城派与考据学家角力相抗，你死我活，也不过是一场‘关公战秦琼’式的想象与造势而已。”[6]124

至此，桐城与扬州二派之间的齟齬始末已水落石出，其中臆想的成分多，可以坐实的内容少。前人心平气和地谈文论学，在带有意气之争的江藩、方东树诸人笔下，竟演绎成为了水火不容的想象。

桐城与扬州二派绵延数百年，方东树与江藩之间的交锋其实是二派观念差异的缩影。在此之前，姚鼐与凌廷堪之间、刘开与阮元之间都有过文论对话。凌廷堪曾致信姚鼐，称自己“于方望溪义法之说，终不能无疑也。”[15]姚鼐如何回复虽不得而知，但他在写给姚莹的家信中批评凌廷堪以《文选》为文家之正派的观点可笑，“所论多谬，漫无可取”。[16]姚门高弟刘开也曾上

书阮元推崇唐宋八大家，颇有以桐城义法来感化对方之意。[17]阮元集中有一篇《与友人论古文书》似复刘开之作。在此信中，他质疑了桐城派的“古文”理念，指出近代古文名家徒然为八股所累，取材有所偏颇。[18]无论是姚、凌抑或是刘、阮，双方都理性而温和，与方东树的“跳踉叫嚣，不知区分论敌主次，一味谩骂”[19]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晚清，两派之间虽仍有分歧，双方态度却都相对平和、克制。刘师培、李详等人曾客观批评桐城派的不足。刘师培指出方苞“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20]4930。以《论桐城派》闻名的李详指出桐城末流“摭实者少，凭虚者多”[4]，“讲闲架，曳虚腔，写一人一事，毫无生气”[21]。他不满足于姚鼐《古文辞类纂》置考据词章于外的做法[22]，也指出了吴汝纶、马其昶之文因疏于考据而出现的错误。[23]在他看来，由于桐城派一家独大，当时的年轻人都只能跟风学桐城，致使桐城文章变成了利禄之道。[24]林纾依附桐城也只是为了生计而已。[25]他希望能够传续骈俪文这一“绝学”，“一洗骛字嵬琐、纤仄号呶之习”[26]。不过，刘、李等晚清扬州派与桐城派之间并无私人恩怨，李详与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人还是知友，他们对桐城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学理层面。桐城派中，林纾、姚永概等人也隐约流露出对扬州派的不满。1915年，姚永概为林纾作序时援引林氏《说文》之语：“世士涂饰以为工，征引以炫博，固无性情之真，且不足以自信。”[27]似指扬州派文章过于讲究文饰而缺乏真性情的流露。林纾也曾不点名地流露出对扬州派文章观念的不认可：“至于近世自鸣为文章巨子者，亦穷迹两汉，吐弃八家，吾恒笑为祝、汪之钝奴，固不如吾藏吏之有真知而灼见也。”[28]这里的“文章巨子”虽未言明何人，但就“吐弃八家”而言，则有批评扬州派之意。

平心而论，二派之间的思想学术及文学观念确实存在差异：扬州派学承皖派汉学<sup>7</sup>，兼采宋学，视选学与训诂为扬州乡学<sup>8</sup>；桐城派学宗程朱（宋学），兼采汉学。扬州派推崇偶言韵语，力图恢复六朝时期的文学观，桐城派追认的则是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但它们的交集也不可忽视：在思想学术方面，桐城派的思想渊源出于泰州学派与颜李学派[29]，而这两派也是扬州派重要的思想来源；在文学方面，姚鼐将戴震的“义理、考据、词章”化为桐城派的理论义理、考证、文章[30]，阮元则强调选学与小学的同质性，即“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同流”[31]。换言之，桐城与扬州派在文学方面皆注重从朴学中汲取营养。在二派均已成为历史的今天回望其对话，若能拨开意气之争的迷雾，便能看到其各具思想光辉的文化价值。

## 二、从省思到合流

方东树《汉学商兑》刊行之日，江藩业已故去，两者之间自然不可能再有交锋。不过，二人之书却成为了后世学人津津乐道的案头书，为两派后学带来思想冲击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省思的机会，促使两派发生内在转变。他们均意识到了独守某种学说之弊，开始有意识地吸纳“对手”的批评意见，进行自我批评与修正。桐城派中，姚范亲近汉学，汉宋兼宗，对方苞的义法之说却不以为然。[32]“师事钱仪吉，受古语法，最称高弟子”[33]的蒋湘南却吸收阮元学说，以戴震、钱大昕、汪容甫、张惠言等人的文章为真古文，而以效法唐宋者为伪八家，堪称桐城派中的“革命者”。扬州派中，阮元晚年修正了自己强调“偶言韵语”的文笔说，仅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其实也是对桐城派的一种让步。

道光年间，汉宋兼容的姚莹曾有意地促进桐城派与扬州学人谈艺论道。姚莹曾两次代理两淮盐运使，其间曾与刘宝楠、刘文淇、梅植之等扬州学人有密切往来，道艺共进。1837年，姚莹与方东树、李兆洛、包世臣、吴德旋、刘文淇、刘宝楠、吴廷飏、王僧保、王翼凤、杨亮、梅植之等人在扬州雅会，姚莹嘱画家吴冠英绘制《谈艺图》（现存安徽省博物馆），画后有姚莹自撰记文。姚莹离任时，刘文淇、刘宝楠、王翼凤等扬州士子恋恋不舍，自发为他作诗送行。[34]从《谈艺图》中出场的人物来看，桐城派与扬州派平分秋色，既有姚莹、方东树、吴德旋等桐城派中坚，也有刘文淇、刘宝楠等扬州派汉学家。他们谈文论艺，相得益彰。即便是在《汉学商兑》中对扬州派颇为不满的方东树，此时也显得松弛而平和。姚莹与扬州学人群之所以志同道合，不仅是因为汉宋兼容的姚莹有意鼓扬风雅、奖拔人才，更是因为双方都有浓厚的经世意识、实事求是。姚莹与扬州学人的广泛交游促使双方学术辞章和谐共进，呈现了桐城派的开放性与灵活性。[34]

咸同年间主政的曾国藩提倡汉宋兼采、汲骈入散，被视为桐城派中兴大将。在经学方面，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曾国藩提倡汉宋调和以化解桐城派与汉学家的宿怨，把经学说成“礼学”，“以为考据、义理、词章、经世，对于治礼都有必要，不存在本

未轻重的区别。”[35]在文学方面，曾国藩以通融的态度对桐城派文论作出了适时的修订，力矫其规模之狭小，超越了桐城派原有的理论格局。桐城派以散文为主调，曾国藩却认为古文与骈体相通，常劝人读《文选》。9 他提出“骈散合一”之说，试图借骈文来纠古文之失，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并主张从汉魏晋六朝文人的骈文及韩愈的散文中去学习古文的写法。他既不主张过分强调古文而排斥骈文，也不主张用骈文取代古文，甚至表现出重新振兴骈文之意，就连扬州派骈文名家李详都认为曾国藩之文“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10 晚清桐城派文脉的延续，主要靠吴汝纶、姚永朴、林纾等数人，而他们的成名成家离不开酌盈剂虚的自我革新，尤其是对扬州派理论的择善而行。吴汝纶对桐城派理论的一大突破就是在于对宋儒义理的疏离，并将其视为对桐城前辈家法的挑战。[36]他说自己“生平于宋儒之书，独少浏览”[37]，反对将“义理之说施之文章”[38]。或因如此，刘师培知己郭象升才会称赞“桐城文派至吴挚甫而变。挚甫欲以雄奇博厚，救桐城虚弱之病”[39]。姚永朴不仅主张调和骈散、奇偶互用，批评桐城末流的文章，甚至主张文章不立宗派 11，这一态度的形成与李详在《论桐城派》中反对文章立派并无关联。林纾对于汉学家批评的“空疏”作出了回应，以“虚枵”代之。他提出作文要“忌虚枵”，去“虚枵”之病的方法是“根柢于经，参以前言往行，然后一一运以古文之法”[40]，即借鉴汉学之法。不仅如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扬州派的文笔之分，指出“名为文者，无所不华；名为笔者，则当求其是”。他能够欣赏六朝有韵之文，以赋为国粹，主张有才华之人可作韵文，反对以语录为文。[40]他广泛涉猎各种骈散文体，大有与扬州派和平共处之意，有了跳出桐城派的自觉。以刘师培、李详为代表的晚清扬州派也有明显改变。随着与桐城派对话的深入，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所推崇的六朝偶文韵语存在弊病：骈体虽然形式优美、声韵和谐，但修饰的成分更高，用词模棱、表意含糊且追求用典，不利于真情实感及复杂思想的表达。更有甚者，为了追求语言形式上的高度齐整不顾文法，以至于文理不通。骈文不仅难作而且难懂，不利于向大众普及。因此，晚清扬州派将六朝式的偶文韵语视为堪与外国文学相竞争的“国粹”，同时也肯定桐城文章与白话文的地位与价值。此外，他们还就争议较多之处作出自我批评与理论更新。出身汉学世家的刘师培却批评汉学家之文流弊在于“剿袭成语，无条贯之可寻；侈征引之繁，昧行文之法”[41]，认为将汉学中的考据视为文学有害于文学发展。过去扬州派普遍轻视唐宋八大家之文，刘师培却肯定“唐宋八家，亦不可偏废”[42]；他还以自己为反面教材，指出骈文之弊在于粉饰造作及游戏笔墨，批评自己过去好作蹇涩之文，“为文力求艰深，遂致文气变坏。欲矫一时之弊，而贻害于后人者，已非浅鲜”，其实“浅深合度，文质适宜”[42]才是最好的状态。李详著有《韩诗证选》，从韩愈之诗中列举众多引用或化用《文选》之处，力证被桐城派视为“古文”领袖的韩愈也精于《文选》，善于骈体。这其实也是沟通桐城、扬州二派文论差异之举。晚清扬州派从批评八家到兼收并蓄、从崇尚生僻字到减少用典，从晦涩艰深到通畅明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桐城派的批评。尽管在表面上仍不免有争讼，但在关键的汉宋学术、骈散文问题上，桐城派与扬州派其实达成了一种默契：汉宋兼采、骈散互鉴。不过，这一局面的形成并非水到渠成，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晚清局势风云变幻，学界、文坛亦随时而变。一时间，今文经学异军突起，汉学宋学已成昨日黄花。骈散之争尚无定论，杂糅的外来文体已乘隙而入。面对今文经学与外来文体的挑战，桐城派与扬州派的关注点都发生了变化，眼中不再只有汉宋、骈散。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二派反应恰如张循所言：“宋学一边视为最大敌人者，也不再是考据训诂之学（古文学）了。这同汉学者疾今文而怨宋学的心理变化正相呼应。”[43]

晚清国运的衰颓使得中国文人纷纷思考救弊之道，革新文学也是重要一环。桐城派树大招风，多有空疏者依附，他们的文章有的索然寡味，有的流于奇诡[20]4932，出现了故步自封、不知变通之种种怪状。[44]崇尚骈俪的扬州派文章也有矫揉造作、文过其实、蹇涩难懂之弊，难以承担中国文学现代化之大任。二派之外，“日本文体”“魏晋文”以及白话文学都在发展壮大，但唯有“日本文体”引起了两派的共同警觉。向来互不心服的桐城、扬州二派在外来文体前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统一在了国粹主义的旗帜之下。

事出有因。“好以日本语句入文”[45]的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崇尚日本作家德富苏峰之文，以富含“欧西文思”的日本文作为文界革命的起点，公开模仿日本文章，文中随处可见日译新名词和外国文法，就连康有为都“常常指责其弟子受日语影响过大”[46]，因此被时人称为“日本文体”或“东瀛文体”12。梁启超既批评六朝文风，又批评唐宋八大家文章，其“日本文体”既挑战了桐城派的“雅洁”之道，又引起了扬州派对中国文学被外来文体所同化的担忧。尽管桐城派与扬州派互不心服，在反对模仿日本文体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在民族危机面前，两派均对新名词（以日语词为主）的大量涌入深感担忧。

桐城派担心其有损于中国文章的“雅洁”，林纾、严复等都曾提出过对“新名词”及“日本文体”的抗议。林纾痛心于“英俊之士为报馆文字所误，而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47]，因此告诫青年学子写文章切忌“糅杂”：“自东瀛流播之新名词，一涉文中，不特糅杂，直成妖异，凡治古文，切不可犯。”[48]最强劲的挑战可能来自于严复。严复翻译尽量求古求雅，宁愿“一名之立，旬月踟蹰”[70]也不愿使用现成的日本词汇，以此抵制东瀛文体。林传甲便深明其苦心，赞扬严复译文是“文之自出新裁者”，批评学习“东瀛译语”不过是“奴隶之性质”。[49]梁启超曾就严复语言的“渊雅”表示质疑，严复则回应自己的文章是给真正的读书人看的，认为梁启超所提倡的文界革命过于浅俗，是对文界的凌迟<sup>13</sup>，颇有火药味。从近代文学变革的视角来看，严复“渊雅”的文体与梁启超以“日本文体”/“新名词”为特色的文界革命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话关系。夏晓虹将这场争论的基本论题视为“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之争。[50]

无独有偶，扬州派旗手刘师培也明确表达了对“日本文体”的不满：“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坎？”[41]在他看来，日本文体没有根基与源流，却在国内风行一时，导致追捧者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文学源流，实为中国文学之不幸。这一态度也影响了其好友钱玄同，钱氏亦认为“东洋文体，粗率之书实不足观，且亦无甚道理”[51]，与刘师培看法相近。

桐城派与扬州派共同抵制“日本文体”获得了朝野上下的声援。“日本文体”在官方遭到张之洞、吴蔚若、端方、樊曾祥等清廷朝官的反对，在民间也遭到了章太炎、叶德辉、王先谦等具有国粹倾向学人的质疑。梁启超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逐渐淡化其文章中的日本因素，塑造出更为丰富多元有活力的新文体，成为了文学革命的先导。携手应对“日本文体”的挑战，正是桐城派与扬州派一次心照不宣的合作。

二派的担忧出于一种忧心国粹沦亡的共同心理，并非杞人忧天。当时“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一变”[52]。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甚至认为：“使用日本词汇，受到日本文体的影响，其实也不仅梁启超一人。即使说所有留日学生都如此，我想亦不为太过。”[53]担心“日本文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担忧被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人所同化。正如国粹派文人黄节所言：“亡吾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与吾同文而易淆也。譬之生物焉，异种者虽有复杂，无害竞争。惟同种而异类者，则虽有竞争，而往往为其所同化。”[54]梁启超振臂一呼，中国年轻一代纷纷跟风效仿，若是举国上下都改用“日本文体”，中国文化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一场对“日本文体”的抵制运动竟然让过去互不心服的扬州派与桐城派团结一心，显示出他们心系国粹的一面。刘师培、李详等扬州派学人是晚清国粹派的主力已广为人知，其实桐城派也在默默支持着国粹保存运动。早在1905年《国粹学报》创办之初，林纾便慷慨捐款二十大洋并致函国学保存会，称当下“新学太昌，古籍之焰垂熠”[55]。他还曾坦言自己坚持桐城旧学的动因在于保存国故：“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席，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用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56]在新学日昌之时，明知自己所讲已不适用于时代，依然要兢兢于此，只是因为要保存国粹。这种心理与刘师培等扬州国粹派人士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尽管桐城派与扬州派追宗于不同的学脉与文脉，保存国学精粹以求华夏文明不坠之心却拳拳如一。

### 三、从江淮走向世界：古典遗产的现代转化

尽管桐城、扬州二派对“日本文体”都持警觉态度，用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昌明国粹，但他们并非域外文化的抵制者。事实上，晚清桐城派与扬州派殿军都曾走出国门，推动了两派与域外的交流。<sup>14</sup>曾门四弟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对域外文化普遍持开放态度。黎庶昌、薛福成都曾出使海外，他们的《西洋杂志》《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等文集以新颖的域外事物作为主要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突破了传统的桐城义法。如果说出使西洋难免有语言壁垒，出使日本则可借汉字达意，黎庶昌也借此积极推广中国文化。1881年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日本朝野人士对桐城派的关心因之高漲。刘大魁的《海峰文集》在1881年的日本翻刻出版，在东京、西京、大阪、名古屋、静冈等各大书店出售。[8]223 桐城派古文也被当作一个体系在日本被理解和接受。据佐藤一郎研究，重野安绎、藤野海南、宫岛大八、西村天因、武内义雄都受到了桐城派影响。出身于明治汉

诗文重镇萨摩的重野安绎是日本当时的汉诗文坛盟主，与黎庶昌多有学问及诗文往还，并曾邀请黎氏及其僚属在上野樱云台赏花。他从黎氏处获知桐城派主张之后极为感动，藤野海南、龟谷省轩也为之倾倒。曾为日本天皇讲授中国哲学的汉学家武内义雄对桐城派圈识法深有心得，与西村天因同声相和。深受武内义雄影响的西村天因晚年笃守程朱理学，提倡道学。他自言从武内义雄处获得的最大的收获是领会到学问应该具有义理、考据、词章三个方面[8]222-223，其遗训便将这三者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考抛其所长、惟恐好而僻、我闻学有方、义理尚寻绎、圣人垂微言、须阐其奥颐、词章有体要、咀华须入格、三者不废一、兼之为硕儒。”[8]226 西村去世之后将其旧藏书奇赠于怀德堂，后来被大阪大学所接收。大阪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櫟、姚鼐、曾国藩、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王先谦等桐城派人士各种版本的文集。与日本其他大学图书馆相比，该校与桐城派相关的图书比率偏高。[8]226 这些藏书也为后世日本学者的桐城派研究提供了滋养。

陶德民的研究亦发现：黎庶昌与藤野海南、宫岛诚一郎、元田永孚、重野安绎、冈千仞、中村敬字、岛田重礼、三岛中洲、川田瓮江等日本汉学名流过从甚密，并且向他们推介桐城派文章。随行的张裕钊长子张沆（也是黎庶昌的女婿）携带父亲文集赠予日本友人，张裕钊随后将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之子宫岛大八收为弟子。宫岛大八在 1887—1894 年期间跟随张裕钊学习八年，回国后在日本的汉语教育及书法领域发挥了指导性作用。明治大正时期，重野安绎在大阪、东京开设私塾，向弟子推介姚鼐、曾国藩等桐城派文章，认为曾国藩之文并无桐城文流于枯淡之弊，“今日桐城派呈现的是辞藻华丽而语意明确的文章。”[57] 其弟子山田准、馆森鸿、西村硕园等人学成后在熊本、鹿儿岛等地教书育人，传播乃师文章理念。其中，西村硕园对姚鼐《古文辞类纂》尤为钟情，不仅在京都大学讲授《古文辞类纂》，收藏有多种刻本的《古文辞类纂》并进行比较研究，还向田中常宪等众多熟人推荐该书及相关书籍。[58]由此可见，黎庶昌、张裕钊二人将桐城文论的重要主张带入日本，通过日本追随者开枝散叶，影响不可谓不广。刘声木所列的桐城派名单中，便有宫岛彦（大八）、中岛裁之、中岛成章、宫岛诚一郎、藤野正启（海南）等日本文人在列。[59]

吴汝纶虽未出使外洋，却也颇有世界眼光。1888 年他接替张裕钊出掌莲池书院，开设西文及东文课，聘请日本教习。他关心如何将西方思想翻译成最清晰、最准确的散文，并认为桐城文体可以担此大任。尽管桐城文章向来与八股文相兼容，吴汝纶却一直主张摒弃八股文，废除科举制度。1902 年吴汝纶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制一百多天，在日本文化界引起轰动。他回国后回乡创办了安徽省第一所西式中学——桐城学堂，延聘日本学士早川新次为教习。尽管吴汝纶在 1903 年初就突然病逝，未及赴京亲自施展其新式教育理念，但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仍在继续。他在日本期间聘请的教育家服部宇之吉来到了京师大学堂，前后任职六年多并聘请了 9 名日本教师，发挥了重要影响。[60]以曾门四弟子为中心的晚清桐城派中外交流虽以文章为中心，却已经突破了文学本身，延伸至教育、书法、外交、语言学、域外汉学等诸多文化领域，对晚清民国的中、日知识界均有深远影响。

如果说晚清桐城派的域外交游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话，扬州派的活动则更具民间性。1907 年初东游的刘师培、何震夫妇在日本的活动以《天义》《衡报》为媒介，以“社会主义讲习会”（后改名为“齐民社”）为组织，与幸德秋水、大杉荣、堺利彦、山川均等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交流频繁，带有社会主义、平民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的色彩。除了与日本革命者交往之外，刘师培等人还与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革命领袖在东京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反对帝国主义，倡导亚洲各民族国家独立。堺利彦曾充满感情地回忆：“当时在东京的中国革命家中，老一辈的有章炳麟，年轻的有张继和刘光汉，以这些人作为中心，还有印度人、越南人、朝鲜人参加，东亚各国的革命主义者在一起集会，确实令人愉快。那个时候，张继和刘师培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的交往渐渐加深。我们的集会他们也会参加，他们的集会我们也会参加。”[61]由此，不难感受到中日革命者之间跨越国界的互助、互进。与此同时，《天义》《衡报》同人在保存汉语的前提下推广世界语，并尝试使用扬州派所崇尚的偶文韵语来翻译世界语诗歌。刘师培将幸德秋水所提倡的平民主义应用于中国平民诗歌的编选、翻译及创作之中，编选的《穷民俗谚录》中收录了不少扬州俗谚，《贫民唱歌集》中自创的平民主题诗作也大都为六朝风格的规整偶文韵语。受到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等理念影响而焕然一新的扬州派文学及学术思想借助《天义》《衡报》等报刊在中日两国有志之士之间广泛传播，成为了 20 世纪初东亚革命者抵制帝国主义压迫、寻求各民族国家文化自立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遗憾的是，他们的行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大杉荣、山川均被捕，《天义》《衡报》被迫停办，刘师培夫妇也不得不逃亡回国。

二派与域外的交流也辐射到了朝鲜半岛。《燕行录》显示 19 世纪上半叶以金正喜、李尚迪为中心的朝鲜文人与以阮元、翁方纲为中心的清朝文人交游频繁，与梅曾亮、吴嘉宾等桐城派文人也有互动。[62]1809 年出使中国的朝鲜文人金正喜与翁方纲、阮元等文人交往往还，也吸收了方苞、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学观念。他的文集中既有若干出色的骈俪文作品，也有不少受到方苞“雅洁”文章观念影响而呈现出朴素简洁风格的散文。[63]既学桐城派古文，又从阮元游的孔子后人孔宪彝经常在家中举办“韩斋雅集”，朝鲜文人李尚迪、卞元圭、安圭、金允植等都曾到访，与叶名沆、王轩、朱琦、冯志沂、程祖庆等桐城派文人进行了诗画交流，被绘制为《韩斋雅集图》，在中韩两国文人之间欣赏与传播。[64]二派对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将传统汉文学与近代思维相结合的韩国汉学家卞荣晚（1889—1954）就以中国先秦散文与桐城派为学习对象，开辟了域外汉文学的新境界。[65]

不难发现，二派与域外的交流都是双向的，既有输出与对话，也有吸收与改变。无论是对域外事物的创新书写，抑或是以六朝风格的偶文韵语来翻译与创作古体新诗，都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体实验。李振声已注意到晚期桐城派文人的“旧”中之“新”，指出新文学所看重的新思想及新感情在吴汝纶、严复等人处已经有了新的突破，与新文学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接续与推衍关系。[66]扬州派所推崇的偶文韵语则是“全世界所没有，而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67]，具有无可取代的“非遗”价值，更何况刘师培将进化论、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等现代理论都融入其思想建构之中，为其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换言之，晚清时期桐城、扬州二派内部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变，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颇有积极影响。

新文化运动虽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来暗指二派，却亦多有得于二派之处。即便是批评桐城派最为激烈的周作人，也承认新文学运动受到桐城派中人的引领：“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曾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68]此言不差。文学革命中，胡适、陈独秀等人便以“立诚”“有物”来要求新文学，而“立诚”“有物”正是桐城派的理论术语。“立诚”出自《周易》中的“修辞立诚”，是“学宗程朱”的桐城派相当看重的理念，其文论核心“义法”说即出于此。戴名世认为“惟立诚，故有物”[69]，从“修辞立诚”中提炼出了“有物”说；而“有物”“有序”说又是方苞对其理论核心“义法”之说的诠释。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主张“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70]，胡适“言之有物”[71]的思想，也根源于“修辞立诚”。桐城派研究者张器友认为：胡适的“言之有物”与桐城派的“言有物”意思相同。胡适的“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也与桐城派观点相近。[72]新文化人使用“立诚”“有物”的语境与具体意义虽然与桐城派并不相同，但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不可否认的。陈独秀出身于桐城文化圈，与李光炯、吴汝澄等吴汝纶弟子交往甚密，早年所办《安徽俗话报》便出自桐城学堂。[73]胡适对桐城派也并无恶感，还曾建议其学生魏际昌重新研究并客观评价桐城派。15 陈平原也指出：“在古代中国的‘文章’中，胡适欣赏的是唐宋八大家及其后裔桐城古文。”[74]尽管新文化人将林纾视为“桐城谬种”的代表而集矢相加，但并不意味着对桐城派的全盘否定。桐城派学术辞章、义理、考据三者结合的方法被很多论家所尊崇。[75]胡适与陈独秀对桐城派术语“立诚”“有物”有意无意的化用，正是这一矛盾心态的反映。随着激进主义思想的退潮，人们逐渐开始注意到桐城派对于现代文化的积极影响。比利时汉学家文宝峰已发现：曾国藩融会中西文化的努力具有远见，吴汝纶提倡西学、推动语言统一、建立现代学校等思想先进，以古文翻译西方爱情小说的林纾使得旧文学有了全新的切入角度，突破了桐城派刻板的道德观。[76,76]王达敏专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桐城派》也从诸多方面展示了桐城派学子的现代传承。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鲁迅、周作人、陈独秀、刘半农等人都曾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其中周氏兄弟对文学独立性的看法受益于扬州派。阮元提倡文笔论，注重文章本身的形式美属性，将其区分于经、史、子，为其赋予了一定的独立性。刘师培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文艺观念的影响，视文学为“美术”（美的艺术），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注重其“性灵”（思想感情）之美，反对以理学、道德束缚文学，突破了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些观点与当时同在东京且与之神交的周氏兄弟志同道合，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文论都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与独立性、反对以理学束缚文学，有别于当时章太炎以文字为文的泛文学观。后来鲁迅将魏晋时期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甚至认为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观接近于西方的“为艺术而艺术”派的文学观。这一论点的提出得益于阮元、刘师培的前后阐发。他们通过区分文、笔，不断地提炼出更为纯粹的文学形态，使得文学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摆脱了与经、史、子的纠缠。此外，扬州派殿军关于保存

国粹的相关思想也被新文化人吸收，成为了“整理国故”及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资源。

江淮文化所孕育的桐城派与扬州派之间虽有标新立异、带有宗派之见的意气之争，但也有对彼此的接纳与吸收。拨开历史的迷雾，两派之间有许多误会本无实据，在后人有意无意的加工之后与史实差之千里。晚清国家民族的存亡危机、现代转型的焦虑以及外来文体的威胁为两派重新审视彼此提供了新的机遇，促使两派从论辩走向合流。昌明国学的共同志向使他们默契配合，共同化解了“日本文体”的危机。晚清洋务运动以及革命思潮的萌芽也为两派的中外交流提供了机遇。清季桐城与扬州派与域外知识人互动频仍，既有与朝鲜文人的诗画往还，也有与日本汉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动、互助，在吸收异域文化之长的同时也积极对外推广各自擅长的中国文学及思想学术，率先进行了融汇中外之学的文体实验并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自我革新。尽管新文化人批判了两派之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它们的理论精华，使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更新的思想资源。

注释：

(1) 夏商时期，桐城属扬州；东汉时期，桐城与扬州同属扬州刺史部；明代及清代前期，两地同属一省管辖；顺、康年间清廷将江南省分为安徽、江苏二省，但两地考生仍共用位于南京的江南贡院。

(2) 扬州派亦有扬州学派、扬州文派、仪征派、文选派等别称。阮元、李详、刘师培、张舜徽、郭象升等学人都对扬州派的论述或梳理。

(3) 刘师培在《戴震传》中对戴震与扬州学派的关系作出了详细的说明，并将发扬戴震之学视为扬州学者的责任：“戴先生之学，出于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约，与江氏稍殊。厥后，训诂之学，传之高邮王引之；典章之学，传之兴化任大椿；而义理之学，则江都焦循能扩之。故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则发挥光大，固吾郡学者之责也。”（刘光汉：《戴震传》，《国粹学报》第13-14期，1906年2-3月）

(4) 据刘师培友人南桂馨述：“昔周书昌、程鱼门论定文章，称桐城为天下正宗。申叔承汪、阮风流，刻意骈俪，尝语人曰：‘天下文章在吾扬州耳。后世当自有公论，非吾私其乡人也。’”（南桂馨：《序六》，刘师培著，万仕国编校：《仪征刘申叔遗书》1，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78页）可见刘师培有光大扬州文派之雄心。另外，钱基博致李详信中亦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扬州乎？”之言。（李详：《与钱基博四函·二》，李详著，李稚甫校：《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0页）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8页。案：梁启超这里的“两派”指桐城派与汉学家，扬州派多精于汉学。

(6) 汪中、凌廷堪祖籍歙县，江藩祖籍旌德。晚明盐商世袭制度的确立促使徽商大规模涌入扬州经商，这一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在此期间徽商一直是扬州的主导社会群体。（参见〔澳〕安东篱著，李霞、李恭忠译：《说扬州》，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第64页）

(7) 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将这一脉络梳理得很清楚。王念孙、刘台拱、阮元、凌曙、刘文淇、任大椿、焦循、黄承吉等扬州派学人均学宗戴震。

(8) 阮元以曹宪、李善、李邕等选学名家都是扬州人，因而视选学为扬州之学。阮元认为自己作为扬州后学，应继承这一选学正统。阮元宅地正好是曹宪故里，因此他在阮氏家庙中建隋文选楼，此楼至今犹存。刘师培之母出自“选楼李氏”，刘师培亦以选学自任。

(9) 曾国藩在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抄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曾国藩：《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与纪泽书》，《曾国藩家书（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74页）曾国藩还强调：“《文选》纵不能全读，其中诗数本，则须全卷熟读，不可删减一字。余文亦以多读为妙。”（曾国藩：《复邓寅阶》，《曾国藩书信》，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10) 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9年第49期，第3-4页。案：乾嘉时代为骈文的复兴期。从骈文这一视角来观察桐城派，会发现有趣的变化。方苞、刘大魁轻视骈文，姚鼐重散轻骈，姚门高弟刘开、梅曾亮、管同等都工于骈文。曾国藩主张骈散兼容，桐城派支流“阳湖派”更是以骈文著称。具体可参看吕双伟《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汪孔丰《遮抑的副调：清代文坛上的桐城骈文》等文。

(11) 姚永朴曰：“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欤！”（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5页）

(12) 不过，熟悉中日语体的周作人却指出：“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散文全集》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页）佐藤一郎也认为梁启超虽然学习了日本新名词，但也与清代散文主流不无关系，他的文章“是新体古文的一种变种，可以算得上是广义的传统文章的子孙”。（〔日〕佐藤一郎著，赵嘉善译：《中国文章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13) “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严复：《与梁启超》，《严复全集》（第8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14) 在此之前，桐城派文集早在江户时期已经输入日本。据佐藤一郎、浅井邦昭、大庭修等日本学者研究，日本人对于桐城派的认识，始于江户时代。随着大量汉籍输入日本，日本汉学界接触到桐城派的一些著作，开始了解和熟悉桐城派文章及其理论。1721-1853年期间，归有光、侯朝宗、方苞、刘大魁、姚鼐等人的文集已经相继输入日本。（李杰玲《日本学术界桐城派研究评述》，《斯文》第五辑，2022年，第307-308页）

(15) 1988年，年过八旬的魏际昌将自己三十年代在胡适指导下所写的毕业论文整理出版，名为《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在其后记（写于保定莲池书院）中说：“胡先生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作‘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魏际昌著：《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

#### 参考文献：

- [1] 曾国藩. 欧阳生文集序 [M] // 曾国藩全集（第14册）. 长沙：岳麓书社，1986：245.
- [2] 阮元. 拟国史儒林传序 [M] // 擘经室集（上）. 北京：中华书局，1993：37.
- [3] 刘师培. 甲辰自述诗 [M] // 刘申叔遗书补遗（上）. 扬州：广陵书社，2008：387.
- [4] 李详. 与钱基博四函·二 [M] // 李审言文集.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050.

- 
- [5] 李详. 方植之汉学商兑与夏仲子乾隆以后诸君学术论 [M] // 李审言文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596.
- [6] 漆永祥. 乾嘉考据学新论 [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 92-100.
- [7] 王达敏. 姚鼐与乾嘉学派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21.
- [8] [日] 佐藤一郎. 中国文学の伝統と再生: 清朝初期から文学革命まで [M]. 东京: 研文出版, 2003: 77.
- [9] 方东树. 汉学商兑 [M] // 汉学师承记(外2种). 上海: [10] 方东树. 上阮芸台宫保书 [M] // 汉学商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352.
- [11] 凌廷堪. 上洗马翁覃溪师书 [M] // 凌廷堪全集(第3册).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86.
- [12] 邱培超. 自“文以载道”至“沉思翰藻”——学术史视野下阮元学圈的文统观及其意义 [M] 台北: 大安出版社, 2012: 328-329.
- [13] 凌廷堪. 书唐文粹后 [M] // 凌廷堪全集(第3册).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293.
- [14] 阮元. 与友人论古文书 [M] // 擘经室集(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610.
- [15] 凌廷堪. 复姚姬传先生书(壬戌) [M] // 凌廷堪全集(第3册).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214.
- [16] 姚鼐. 与石甫侄孙 [M] // 惜抱轩尺牍.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4:137.
- [17] 刘开. 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M] // 桐城派名家文集(第4册): 刘开集.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52-55.
- [18] 阮元. 撰. 邓经元. 点校. 擘经室集(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09.
- [19] 朱维铮. 清学史: 汉学与反汉学一页(下)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 (6): 75.
- [20] 刘师培. 论近世文学之变迁 [M] // 仪征刘申叔遗书 11. 扬州: 广陵书社, 2014: 4930.
- [21] 李详. 致缪艺风十九函·十六 [M] // 李审言文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1091.
- [22] 李详. 与钱基博四函·一 [M] // 李审言文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1048.
- [23] 李详. 与钱基博四函·三 [M] // 李审言文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1055.
- [24] 李详. 答江都王翰棻论文书 [M] // 李审言文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1062.
- [25] 李详. 论桐城派 [M] // 李审言文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887.
- [26] 李详. 江都汪氏丛书序 [M] // 李审言文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891.

- 
- [27] 姚永概.序[M]//畏庐续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16:1.
- [28] 林纾.百大家评选韩文菁华录序[M]//畏庐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8.
- [29] 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98.
- [30] 姚鼐.述庵文钞序[M]//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1.
- [31]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擘经室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6:388.
- [32] 汪孔丰.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160.
- [33] 刘声木,撰.徐天祥,校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M].合肥:黄山书社,2011:188.
- [34] 汪孔丰.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8-104.
- [35]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1-62.
- [36] 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99.
- [37] 吴汝纶.答吴实甫[M]//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95.
- [38] 吴汝纶.答姚叔节[M]//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94.
- [39] 郭象升.文学研究法渊照楼杂著[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136.
- [40] 林纾.春觉斋论文[M]//春觉斋论画(外一种).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66.
- [41]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J].国粹学报,1907,(26).
- [42]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M]//刘申叔遗书补遗(下).扬州:广陵书社,2008:1517.
- [43] 张循.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32.
- [44] 李详.论桐城派[J].国粹学报,1909,(49).
- [45]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M]//梁启超全集(第17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62.
- [46] [比]文宝峰,著.杨蕾,译.新文学运动史[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8-9.
- [47]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序[M]//林纾集(第5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273.

- 
- [48] 严复.译例言 [M] //严复全集 (第 1 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236.
- [49]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 141.
- [50]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5.
- [51] 钱玄同.1906 年 4 月 2 日 [M] //钱玄同日记 (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3.
- [5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109-110.
- [53] [日]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45.
- [54] 黄节.《国粹学报》叙 [J].国粹学报, 1905, (1).
- [55] 《国学保存会报告》第一号 [J].国粹学报, 1906, (20).
- [56] 林纾.文科大辞典序 [M] //畏庐续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16: 10.
- [57] 陶德民.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形成:汉学革新与文化交涉 [M].辜承尧,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75.
- [58] 陶德民.桐城派古文理论在明治大正时期的影响——对藤野海南、重野安绎、西村硕园等人的考察 [J].刘静,译.当代比较文学, 2021, (2): 92-116.
- [59] 刘声木,撰.徐天祥,校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 [M].合肥:黄山书社, 2011:335-371.
- [60] Timothy B. Weston. 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48.
- [61] 堺利彦.人の面影 [M] //堺利彦全集 (第四卷).东京:法律文化社株式会社, 1971: 252.
- [62] .19 前半 燕行録 朝・清 文化 交流 [M].首尔: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 2018:摘要.
- [63] .秋史金正喜散文 [J].大東漢文學, 2005, (25): 67-92.
- [64] .晚清孔憲彝‘韓齋’ [J].韩国学论集, 2018, (73): 307-325.
- [65] .卞榮晚 文章觀 自得 [J].大同文化研究, 2006, (55): 297-322.
- [66] 李振声.晚期桐城“文”观念的“旧”中之“新” [J].文艺争鸣, 2011, (16): 21-32.
- [67] 郭绍虞.再论文言白话问题 [M] //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75.
- [68] 周作人.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 [M] //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 6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89.

[69] 戴名世. 答赵少宰书[M] // 桐城派名家文集(第12册): 戴名世选集、方苞选集.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112.

[70]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917, (2).

[71] 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M] // 胡适全集(第1册).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4.

[72] 张器友. 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5: 231-233.

[73] 张器友.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J]. 人文杂志, 2013, (7).

[74] 陈平原. 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J]. 中国文化, 1997, (Z1): 293.

[75] 王琼, 力之. 从明“学”层面看高氏《义疏》之“繁琐”——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研究之一[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 122-130.

[76] [比] 文宝峰. 新文学运动史[M]. 杨蕾, 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1:1-6.

[76]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 // 鲁迅全集(编年版)(第5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118.